

中產不穩的社會後果

梁繼昌 公共專業聯盟副主席

(刊於 2008 年 11 月 5 日，信報「專業眼」)

在紐約，一個替僱主向在職人士進行心理調查的機構在上星期發布調查結果，報告顯示百分之九十二的在職人士均曾因金融海嘯而導致失眠及焦慮。在香港，兩個志願輔導機構所設立的「金融危機熱線」，自設立以來已接獲過千宗的救助個案。求助者中不乏中小企東主、中產及專業人士。據悉，某些個案中涉及金額數量及情況之複雜，亦非一般輔導員可以應付。而其中有八十多宗個案因事主情況比較嚴重甚至出現自殺念頭而須個別深入跟進。

也是在香港，自九月以來已至少有兩名中小企東主、一名教師、一名銀行經理及一名醫院行政人員因經濟及工作衍生的情緒問題自殺。這幾宗悲劇在澎湃的金融海嘯中並未引起廣泛注意。政府甚至連一點因事制宜的回應或措施也欠奉。在標榜構建和諧社會為頭號任務的特區政府來說，這些事件就是連一宗也嫌太多，政府能給市民一個反應嗎？

「中產生活」重新定義

中產在海嘯中的抗「跌」能力及情緒指數並不比其他社群高。相反，一般社會學者均相信中產因為要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而要「死撐」及逆向游泳而終至沒頂。據一些地產經紀透露，受僱於金融及銀行業的僱員往往將每月固定薪金的八成花在樓宇租金，而其他生活開支則依靠一份由僱主酌情發放的花紅。在褲頭緊的日子裏，這消費方式絕對行不通，再加上其他七葷八素的固定開支如子女教育費等，要某些中產家庭徹頭徹尾改變消費及生活方式絕對是一樁不愉快的事件。相對善於找心理專家輔導作為階級標誌的紐約人來說，香港的中產亦會因為文化包袱及自尊心作祟而傾向把情緒問題留給自己解決，因而延誤尋找專業輔導的機會而把問題惡化。

中產向來是一個成熟公民社會的內部穩定力量、政府有效施政的合作伙伴及監察者。香港中產向下流動的勢頭已不是始於金融海嘯*。海嘯只是把向下流動之勢變為洪峰。在海嘯席捲全球之際，政府針對中產的社會政策實在乏善足陳。誠如一般市民所想，中產並非需要大量金錢扶助的一群，政府的有效措施必需首要穩定中產的情緒及其受僱機會。

彈性安排 持盈保泰

就第一點來說，政府必須將情緒輔導服務的資源加碼以及具體化，及確保本地有足夠的專業心理輔導人材以應付不時之需。

其次，根據一跨國管理顧問公司的研究顯示，海嘯並非意味着僱主必定裁員及削減職位。有遠見的企業，會在經濟低迷時，重整旗鼓，調整其人力資源政策，以一個較合理價錢延聘或挽留更多優秀人材，以備在經濟復甦時大展拳腳。問題是，僱員能否在經濟蕭條時向僱主證明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一員。有見及此，僱員須趁機自我增值，政府應把持續進修基金的合資格課程擴大、提高資助金額。再者，政府亦應該在下一個財政年度增加自我進修開支的稅務扣減金額，由現時的六萬元加額至十萬元。

在勞資關係方面，有學者認為《僱傭條例》應該改動以應付金融海嘯。修改《僱傭條例》牽一髮動全身，要在數月之間要作出諮詢及改例實非易事。退而求其次，政府可透過勞工處向僱主作出政策性指引，要求僱主在遣散之前，能審時度勢，讓受影響之員工調職，又或者作出其他勞務安排：包括由全職轉為半職或作出分享職務的安排，務使把勞動市場的震盪減低。長遠來說，法例應作出相應修改，令僱主能承諾在慎重考慮其他可行方案都無效後才作遣散安排。

逆境求存之道，也在乎中產對於生活的取態。海嘯除了啓動國際金融及銀行體系的宏觀改革契機外，也開展了生活上的靜默革命。十月二十三日美國一著名週刊以新簡約主義 (New Frugality) 為題，鼓動低消費。以實用見稱的香港人，並不需要甚麼主義，但一個低消費、低碳及低信貸的個人生活方式也許就是中產在後海嘯中「抗跌」的靈丹妙藥。

* 詳見公共專業聯盟《機會之都：香港中產萎縮研究報告》
(www.procommons.org.hk/chi/report.htm)